

“有感觉的男性身体”

——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

赵冰

(外交学院英语系,北京 102206)

[摘要] “身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识字的用途》中的重要隐喻。理查德·霍加特通过这一隐喻描述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的腐蚀以及通过奖学金男孩“有感觉的男性身体”所实现的文化反抗。“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复合了更为古老的“身体”:它扬弃了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感觉”话语,整合了奥威尔登左派批评传统对“身体”的再现。作为三种身体形态之一,“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囊括并超越了大众文化被性化、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体和永恒的母性身体,体现了变化—拒绝变化的二律背反;它既是社会瘀伤的症候,又通过特有的感觉能力为治愈社会提供了药方。

[关键词] 理查德·霍加特; 大众文化; 男性身体; 身体复合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2-0049-05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3大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所受到的学术关注远不及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他的代表作《识字的用途》尽管被《卫报》誉为“稳居二十世纪伟大书目之列”^[1],但是还没有中文版,且既有研究大多置霍加特于利维斯文明—文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如约翰·斯道雷尽管肯定了霍加特在文化研究初始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却认为利维斯传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它无疑是文化分析中的主导范式^[2]。固然,利维斯传统已然成为英国学术、非学术生活某些领域中被压抑的“常识”,然而,身处“传统”中的霍加特是否也彰显了“个人才能”呢?换言之,他对利维斯的批判性继承体现在何处?他的文化书写又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利维斯之外,霍加特是否还站在了其他“巨人的肩膀”上?

这些问题纷繁复杂,非一言两语所能穷尽,然而,霍加特似乎也为我们预留了出入这些问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在《识字的用途》中,他借用“身体”的隐喻书写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时代问题:大众文化的“靡靡之音”使感官钝化、身体支离破碎,工人阶级母亲健康有活力的身体和奖学金男孩“有感觉的男性身体”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

度上为大众文化提供解毒剂。作为文化批评术语,霍加特的“身体”,更确切地说,他笔下的半自传人物——“奖学金男孩”——的“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受之于利维斯,但它还复合了其他更为古老的“身体”:浪漫主义的“身体”、威廉·莫里斯和乔治·奥威尔的左派“身体”……,这种“复合”或许正是霍加特对早期文化研究的独特贡献。

一 “身体”的三种形态

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霍加特描述并评价了3种不同的“身体”:象征大众文化的支离破碎的女性化身体,象征拒绝变化、被去性化了的工人阶级母亲的“身体”以及以“奖学金男孩”为代表的“有感觉的男性身体”(the feeling male body)。“有感觉的男性身体”超越了前两者,既是文化危机的症候,又提供了克服危机的方法。

在《识字的用途》中,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掠夺通过身体所受到的影响得以表现。这一影响首先表现为感官的钝化,即霍加特笔下的“麻醉”或死亡。他写道:“大部分大众娱乐终归是劳伦斯所说的‘反生活’的……这些产品属于二手的观望者的世界;它们没有提供任何能够真正地抓住大脑或心灵的东西。”^[3]³⁴⁰霍加特用被动性、中介性、观望者拒

[收稿日期] 2017-02-22

[基金项目] 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文化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及民主批评”资助(编号:3162014ZYQDYB06)

[作者简介] 赵冰(1984-),女,河南焦作人,外交学院英语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绝参与、甚至“死亡”的躯体喻指大众文化。举例而言,在描述匪徒小说时,霍加特用无生命的躯体意象比喻这种文学的劣质:“匪徒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死亡的,因为它只是‘在部分中展现生命’。”^{[3]267}这个观点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真正的艺术是有益于生活的,它作用于读者或观众的五脏六腑,能够赋予身体以活力。霍加特以福克纳的小说《避难说》例证此类文学,并因它“探索了小说的本质”^{[3]268}而对之大加赞赏。在这类真正的文学中,文本—身体、作者—身体与读者—身体三位一体:作者通过生动的语言于文本—身体中创造出鲜活的感官形象,唤起读者可能沉寂的身体性和活力。其二,如何判断一种文学更加“身体”——霍加特将名词形容词化,称“福克纳的小说比匪徒小说拥有更多身体”?霍加特暗示,统一性是重要的评判标准,部分必须服务于整体,细节必须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否则,即使“部分”中展现了生命,整体依然可能是死亡的。

大众文化对身体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它迫使身体支离破碎。在霍加特所描述的新杂志上,“身体”——主要为女性身体——被表征为部分:“大腿的翻转或肩膀的弯曲”、“乳房之间的沟壑”、“不透明材质下乳头的突起”等。而被表征的“部分”内容反映了表征方式的碎片化,用霍加特的话说,便是“东拼西凑的碎片到处撒野”^{[3]216}。这是新杂志等大众文化形式与优秀文学的区别所在,也是其失败之症结所在。值得指出的是,霍加特并不反对意象的身体性,他真正反对的是这些意象缺乏生命活力:“这种性—兴趣主要集中在头脑和眼睛里,一种隔离的二手物。它自认为是聪明、精致的兴趣,实则毫无生气,被简化为范围狭窄的反映。”^{[3]222}

然而,“身体”并非完全被动,物质即是能量。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讨论了工人阶级对大众文化之节奏和“甘言劝诱”的抵抗:“这不仅仅是消极的抵抗力量,而是积极的力量,尽管其发声仍含混不清。工人阶级拥有强大的适应变化的自然能力,他们改编或同化新事物中自己所需的元素,丢弃其他。”^{[3]32}工人阶级母亲充满活力的“身体”及“奖学金男孩”受伤的“身体”象征了这种反抗,它们与大众文化“棉花糖世界”中毫无生气、支离破碎且被性化了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传统是抵抗的坚固堡垒,工人阶级“凭借直觉、习惯性地生活,利用神话、格言和仪式依靠语言生活。”^{[3]33}在霍加特对母亲的处理中,母亲象征了传统和延续性,她拥有所有传统的“质”:她的面孔印证了流转不辍的生活的痕迹——常年快速潦草地洗

脸导致污垢沉淀,积年累月的精打细算留下了皱纹;习惯性的动作,无论是有节奏的抚手,嘴角的抽动或稳定的摇摆都诉说着多年的生活^{[3]49}。与“空洞”和“亮闪闪”的大众文化相比,“污垢”和脸部的“鳞状质地”虽不美丽,却暗示了某种深度和坚实的可靠性。并且,与大众文化被性化了的、廉价而华丽的女性气质相比,母亲被去性化乃至无性化了:她们年过三十,就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性吸引力,不久的将来便“身材走样”;她们操持着家庭,这个家庭既不廉价,也不忸怩作态或反复无常。

霍加特从外形和无意识的习惯动作方面刻画了工人阶级母亲的形象,问题是,母亲的情感生活呢?母亲的“身体”象征着传统对大众文化的抵抗,但她并没有被赋予强烈的感知能力,也缺乏福克纳式丰富的内心生活。卡洛琳·斯蒂德曼认为,情感上的被动和工人阶级生活的“千篇一律”是霍加特笔下母亲的主要特征^[4]。然而,这些缺失的元素在“奖学金男孩”——霍加特的半自传人物身上得到了有益的补充。

“奖学金男孩”是二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产物。他们大多出身工人阶级,凭借政府资助上了文法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跻身学术中产。然而,与社会地位之提升相伴而行的是强烈的“无根感”和“焦虑感”:他们既无法回到自己的原初阶级,又不能完全融入由中产阶级主导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与母亲缺乏内心生活的扁平化形象相比,“奖学金男孩”至少是有感觉的,而“感觉”(feeling)在20世纪便是政治。它是当代生活的索引,以一种语言无法企及的方式记录了经验。语言的中介性特征使自己能够紧紧跟随经验,但却不能与之相携同行,而感觉与经验是直接性的同盟;“感觉”更易接近,更为“民主”。霍尔曾说:“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嗅到我们社会上的权力集中和滥用,但是谁能将它们命名?”^[5]。他还说:“我们需要全新的观看方式,需要全新的方式来言说根深蒂固的文化矛盾,这些矛盾在我们的感觉、反应方式、道德生活模式及姿态中处处可见。它们超越了政治语言——至少超越了政治小册子和竞选活动的语言。”^[6]“感觉”不仅为了解当代社会打开了窗户,为人们把握战后新的经验提供了通道,还突破了霍尔所描述的“政治生活的冷漠及经济学理论的狭隘”^[6]。霍尔曾抱怨道:“我们的政治缺乏情感相关性和共鸣,缺乏人性:它僵硬、枯燥、毫无色彩,颇具安抚性。”^[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是平等,还包括“为权力和感知能力辩护”^[6]。这样,霍尔便在感觉和现代性、新奇、变化

及活力之间搭起了桥梁，“感觉”成为了别样的政治激进主义。

与霍尔相比，霍加特的政治更为温和，他拒绝通过剧烈的变化实现文化复兴和社会革新，转而求助于浪漫主义的个人反抗，即坚持文化理想之重要性。这种反抗可见于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相面术”式描写：“变皱的额头，紧皱的眉毛，阴暗的眼睛，最重要的是嘴巴，下嘴唇如果不是因为上嘴唇的紧绷就松懈了。而上嘴唇掩饰了更强烈的不满，暗示了为避免更大的损失而采取的坚忍不拔（quasi-stoicism）。”^{[3]315}在霍加特看来，这样的脸庞不仅记录了生活的艰辛历史，还使人联想到从文艺复兴到鲁滨逊、卢梭等的拜伦式英雄：他们富于想象却耽于行动，愤世嫉俗且自怨自艾，“坐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被悲惨和铁链牢牢束缚着”^{[3]258}，却也锲而不舍，苦苦问寻：

我们宁愿被毁灭也不愿被改变，

我们宁愿在恐惧中死去也不愿爬上眼下的十字架

看着幻想死去^{[3]258}。

“奖学金男孩”就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浪漫主义英雄。在多人被新兴的电视、封面女郎挂像和影院大屏幕催眠、昏昏欲睡之时，奖学金男孩的感知能力和内心生活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文化重要性。他们是“尽管受伤却更加敏感的社会的触角”^{[3]258}，他们“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囊括并超越了大众文化被性化、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体和永恒的母性身体，体现了变化—拒绝变化的二律背反；它既是社会疗伤的症候，又通过特有的感觉能力为治愈社会提供了药方。霍加特曾引用威尔森大主教的名言说明这一药方的重要性：亟需被唤醒的人远远超过需要安慰的人^{[3]259}。“感觉”消除消费文化的恶果，唤醒社会中沉睡的大多数。

二 “身体”的复合

霍加特的“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并非自天而降，而是古老之“身体”的复合。它扬弃了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感觉”话语，同时整合了从威廉·毛里斯到奥威尔的左派批评传统对“身体”的再现，将“感觉”与工人阶级的男子气概相衔接，创造出与生产性的、劳作的“身体”相分离、粘附在消费性“身体”上的新式男子气概。

“身体”是利维斯常用的批评术语，大量出现于他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对该术语的理解必须放置在利维斯文明—文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在

20世纪的英国社会，与工业革命诞生的科技相携而行的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人们沉沦于物质追求，普遍患上了无法整合思想和感觉的“现代病”。利维斯称这样的世界为“文明”，它不仅大批制造了物质产品，还生产了被异化的个体和支离破碎的原子化社会。而大众文化如电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生动的实际生活的幻像”。利维斯以“文化”抵抗这样的“文明”。“文化”既是精神价值的家园，又意指特里·伊格尔顿所描述的“语言层面的丰富、复杂、激发美感的和具体的”^[7]。真正的文化只归少数人保管，它具有不经中介的实感，能凭借其“具体的活力，感官的直接性和充满生命的呈现”^{[8]97}使读者和观众“复活”。

对利维斯而言，“身体”以其独有的特征成为了“文化”当仁不让的最佳隐喻。它依赖于一种“完整性概念以及意识与肉体的契合”^{[8]98}，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题”。“身体”同时为语言的隐喻性提供了例证：它由指植物、动物、人等有机体的整个结构引申为为了某一共同目标、按照某种原则组织而成的社会或群体。因此，“身体”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与艾略特一样，利维斯心之向往的社会—身体是16、17世纪前工业化时代的有机社区；而论及微观的人—身体时，利维斯强调情感整合思想和感觉的重要性。与工业社会“情感生活的劣质”不同，在有机社会里，“思想和感觉接合于词语中，这些词语以身体的感知呈现其意义。它们由表达行动、想法、身体的态度及其成员的简单动词构成。”^[9]

除了暗示完整性和统一性之外，利维斯的“身体”还具有潜在的破坏能力。这一能力是利维斯吸引新左派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使二者就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结成了统一战线。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在评价《细察》时说：“《细察》在某些方面是新左派的天然同盟……它坚决地反对‘文明’，这个‘文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10]330}这种破坏能力具体表现为艾莉森·皮斯所描述的“令人充满活力的震惊”。“震惊”原本主要与感觉小说和色情作品对读者的情感剥削相关。然而，20世纪，“震惊”成了对抗大众文化被动和令人感官迟钝的效果的积极术语，其逻辑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异曲同工：既然美令人昏昏欲睡，就以“恶”惊世骇俗。

在利维斯的批判模式中，工人阶级的男性身体被视作可鄙的大众文化的象征。而霍加特从自己的工人阶级经验出发，为工人阶级的男性身体“洗白”，赋予了他们“感觉”^①。不过在霍加特那里，“感觉”没有表现为“震惊”，而是迷茫、犬儒主义、自

我怜悯以及最重要的——克服了这些消极情绪之后达到对周遭环境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的自我反省。“他们(奖学金男孩)的根经常被挖掘出来用于细察;他们成为了智力上的流浪儿。追问从未停止,害怕找到答案的恐惧也从未间歇……被淹没了的理想主义和普遍的犹豫不决保证他们不会“乘机获利”:从根本上,他们很在意,他们想做正确之事。在很多方面,他们渺小、可怜且任性,然而,自我意识,尽管有各种恶果,却不失其魅力和优点。”^{[3]258}自我意识使得“有感觉的男性身体”能够“众人皆醉我独醒”,成为批判大众文化的敏锐的社会触角。

霍加特对利维斯的扬弃还表现在从关注生产性身体转向消费性身体。利维斯区别了健康的、生产性的身体和与大众文化相关的消费和享乐的“身体”。他强调,“身体”的享乐能力(必须)被工作——无论是体力活动还是文学批评等脑力活动——调和。然而,“生产性的身体”与霍加特的时代经验格格不入。伴随着1929年(亦即利维斯写作的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生产性的身体”已经日暮西山。根据利奥·洛温塔尔的观察,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从如何生产产品转变为如何消费产品。“消费性”的身体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霍加特的代表作《识字的用途》中,鲜有利维斯笔下的手工艺人,而只有阅读流行杂志的工人阶级以及沉迷于美国文化的“电唱机男孩”——他们都是消费者啊!

“消费性”的身体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利维斯强调“感性”,即感官的敏锐性和鲜活性,批判布鲁姆斯伯里所代表的贵族的、美学化的都市精英文化。他毫不客气地写道:“布鲁姆斯伯里的常客培养了吸取最新市场行情的敏捷,对广泛的指涉物无所不知”^{[8]8}作为权威的继承者,这些知识分子过于理智了,他们过度精明老练的文化远不及“震惊”所代表的感性文化。相较之下,霍加特亦反对任何迎合市场行情的“工具理性”,此外,他格外强调“有感觉的男性身体”的反思能力,因为只有反思,才有自我意识,才有“奖学金男孩”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霍加特还受到了左倾思想明显的威廉·莫里斯和乔治·奥威尔的影响,将男子气概浪漫化了。丽莎·贾丁和茱莉亚·斯温得尔斯认为,英国的左派“总是允许十九世纪的家长式小说调解自己的阶级历史”^{[11]3},即他们倾向于依靠文学、小说和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为阶级意识提供证据。这种传统生产了可信的阶级意识版本,在该版本中,妇女被抹去

了。此类叙事可一直追踪到20世纪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通过比较奥威尔的日记和付梓的文本,贾丁和斯温得尔斯发现,奥威尔早期的日志观察和既成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文学文本中,工人阶级男性身体被美学化了,并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奥威尔如此描述男人:“高贵的身体”:“宽宽的肩膀逐渐消失,与纤弱灵活的腰肢和小却突出的屁股形成了尖锥形,全身没有丁点儿肥肉。”^{[11]11}然而,在“这般男子气和工作的田园诗中,文学文本抹去了日记中对妇女的生动记述。”^{[11]16}日记中原本筋疲力尽、并不幸福的女人在文学作品中变形成了为自己的丈夫营造舒适家庭的顾家小女人。奥威尔因此延续了左派文学的“道德现实主义”传统,在这种传统下,艺术和家庭都承载着道德重担:妇女与被美学化了的家庭相联系,而家庭被视作道德价值观的支持者而非政治领域。

三 结 论

霍加特“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复合了利维斯的“身体”批评话语和被左派文学家浪漫化了的工人阶级男性身体。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这种杂交的“身体”既是文化危机的症候,又是治愈的良方。它偏离了奥威尔等老一辈左派作家的英勇的、高贵的劳作性“身体”,转向了以“感觉”能力见长、略微阴柔的消费性身体。正是这种“感觉”,使“奖学金男孩”不至于沦为“文化玩偶”;正是这种“感觉”,使文化理想成为可能。我们大可以如某些批评家一样,声称霍加特的“感觉”成就了他的“政治”,他的“政治”遗憾地止步于“感觉”。但今时今日,又有几人能抵御大众文化的致幻剂呢?甚或,当人们怀疑大众文化确为致幻剂这一说法的合法性时,已然被“致幻”?倘若如此,谁又能否定霍加特所说的“感觉”的重要性呢?

注释:

①霍加特对“经验”的崇拜亦来自利维斯的影响。佩里·安德森认为,利维斯文学批评的认识论的主要形式不是肯定性的,而是质问性的。“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利维斯习惯于以反问的形式要求读者在“质问”文本的同时“质问”自己的经验,最终形成关于文本的批判性判断。也就是说,个体经验使批判性判断生效。

[参考文献]

- [1]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apr/10/richard-hoggart>.
- [2]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 [M]. Sydney: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2006: 25.
- [3]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 [4] Caroline Steedman.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26.
- [5] Hall S. Politics [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Winter 1957, 2(4): 1-5.
- [6] Hall S. In the No man's Land [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Winter 1958, 3(4): 83-90.
- [7]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8: 36.
- [8] F R Leavis. *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The Clarke Lectures 1967*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9] Allison Peas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and the Aesthetics of Obscen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0.
- [10] Francis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nity"*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330.
- [11] Julia Swindells, Lisa Jadine. *What's Left? Women Culture and the Labor Movement*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Richard Hoggart's Culture Critique

——The feeling male body

ZHAO Bi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Body features an important metaphor in Richard Hoggart's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one of the three founding texts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This metaphor maps the cultural situation in post-war Britain, especially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al working class culture by mass culture and such resistance against it a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feeling male body of the Scholarship Boy. The feeling male body, as the combination of older body forms, goes beyond the female body sexualized by mass culture and the emotionless, asexualized Mother's body, functioning both as the symptom of the culturally bruised society and its antidote.

Key words: Richard Hoggart; mass culture; male body; body synthesis.